

中国现代女作家论稿

王家伦 著

中国妇女

(京)新登字032号

中国现代女作家论稿

王家伦 著

责编：王卫东

出版：中国妇女出版社

发行：中国妇女出版社

印刷：北京曙光印刷厂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8.75

字数：189千字

版次：1992年1月北京第一版

印次：1992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书号：ISBN7-80016-635-X/I·122 定价：4.20元

序

近两年来，我几次前往徐州开会或讲学时，都有机会与家伦晤面畅叙。他很详尽地谈起了自己研究中国现代女作家的计划。这确实是一个极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然而想要完成它却又是相当艰巨的，因为在这方面的研究现状，还可以说是处于开拓和起步的阶段，在这个庞大的领域里面，可资参考和佐证的研究成果不多，这样就得花费很多的精力去搜罗资料，更困难的是还要从理论分析方面作出全面的建树，既要有微观方面切实细致的研究，又要尽可能升华到宏观的方面，对于它的全景及其种种内部的规律，能够进行总体的把握，这确实是谈何容易的事情，所以每当跟他交换意见时，我都祝愿他在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之后，能够圆满地完成这样的任务。

家伦是一位谨严和踏实的现代文学研究家，他不尚空谈，却总是埋头于自己的研究工作。这几年中间，我陆续在不少学术刊物上读到过他的研究论文，读完之后也都留下了这种谨严踏实和力求切中肯綮的印象。因此在今年暮春季节，当他提出要我为这部即将竣工的《中国现代女作家论稿》撰写序言时，我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替朋友们写的序言可谓多矣，不过这些都是经过了慎重的选择，才会欣然命笔的，而选择的唯一标准是文章必须写得切实认真，这样我就愿意在仔细阅读和努力学习的基础上，写出自己一点儿读后的感受来。

不久之前，当我一字一句地读完了他寄来的这部稿件时，真为他终于完成了这个宏伟的计划而感到高兴。我还深感家伦的这项研究成果，比起他历年来零星发表的那些篇章，精辟的见解就更多了。看到象家伦这样比我年轻一点儿的朋友，能够达到这种不断超越自己的学术境界，我心里的欢乐实在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而且还衷心地钦佩他这种治学的干劲和毅力。

凭我多年从事文学研究的经验来说，深知大凡想要获得成就的话，总是应该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领域中去，时刻与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的对话，揭示出作家们进行艺术创作的心灵奥秘，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规律了。家伦正是这样去做的，他在此书的“后记”中，叙述了自己“徜徉于现代女作家王国里，与她们进行心的交流”的这种经历。由于他充分地想要了解中国现代女作家心灵的奥秘，才保证了自己的这部书稿，能够立足于这个带有关键性的基点上，对她们创作中的思想和艺术特征，作出了全面而又深切的阐述。

正是这个进行了“心的交流”的出发点，又必然会促使家伦去实现自己在“后记”中所说的，“将她们的创作历程、文学风格反映出来”的目的，并且进一步解决了自己在此书的《中国现代女作家论纲》中提出的任务，十分清晰地阐述了“她们的创作有什么特色？有何嬗变、演进？对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家伦确实很善于将“五四”之后出现的两代女性作家，放置在当时那种运动和发展着的文学背景上进行观察和研究，因此对于她们的创作在艺术表现与思想主旨方面的基本特色，能够作出很有说服力的分析与阐述。象这样

全面和细致的比较研究工作，就牢牢地把握住了不少具有规律性的现象，这对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域来说，也应该说是作出了值得注意的贡献。

据我所知，在海内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对于“五四”以来女性作家的研究，个案分析的情况相当不少，也作出了明显的成绩，但是象家伦这样进行广泛、系统和全面的研究工作，还是比较罕见的，因此这部《中国现代女作家论稿》的问世，确实很值得欢迎。在衷心的欢迎之余，我还建议家伦在已经取得了这个出色成就的基础上，能够进一步致力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的研究，力图在充满丰富复杂的历史线索的精彩叙述中，更好地去挖掘出理论的深度，升华出理论的高度来。

眼前的这部《中国现代女作家论稿》，跟我建议他撰写的《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确实是既有一致的地方，又有迥然相异之处。前者是从微观的角度，展开对有关问题的说明；后者却是从宏观的角度，把握其全部情况的衍变规律。前者主要是集中于具体的分析，每一篇章之间还缺少整体的凝固性；后者却是充满了历史线索的整体，充满了理论色彩的阐述。当然有了前者这个坚实的基础，后者的出现自然就比较容易显得轻车熟路，而不会是一桩困难的事情了。

我深切地希望家伦下一步的研究工作，能够多少考虑上述的这个建议，以便做出更上一层楼的成绩来。正象家伦所引用的马克思的这些话语，“没有妇女的醒来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而研究这项立足于描绘“妇女的醒来”的文学课题，/应该会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我多么愿意重游徐州，能够再次与家伦剪烛西窗，进一步探讨与切磋中国现代

女性文学这个充满了魅力的话题。

今年夏天，我去汉城参加一个国际性的学术会议时，曾参观了第24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会场。望着这空无一人的比赛场地，和人去楼空的运动员活动中心，不能不想起当年有多少体育健儿们，在此大显身手的勃勃英姿。我十分欣赏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这个口号：“更快，更高，更强”。对于治学来说，不是也应该同样地向这个崇高的目标迈进？人生能得几回搏？希望家伦通过自己的努力拼搏，能够写出更具理论深度的研究著作，这样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新文化来说，自然也就可以作出更大的贡献。我正在热忱地企盼着这一点。

林 非

1991年11月14日于北京紫竹院

目 录

序.....	林 非
中国现代女作家论纲.....	(1)
论冰心的“问题小说”.....	(16)
心灵的潮汐.....	(27)
——略论冰心的《繁星》和《春水》	
“放大的《繁星》和《春水》”.....	(42)
——论冰心“五四”时期的散文	
庐隐简论.....	(55)
冯沅君和她的小说.....	(69)
“在黑暗中摸索寻求光明”.....	(81)
——石评梅和她的创作	
对新文学运动的切实贡献.....	
——评陈衡哲的小说	
略论林徽因的创作.....	
她画出了“高门巨族的精魂”.....	(
——论凌叔华的小说	
“对旧制度和金钱势力宣战”.....	(132)
——白薇及其文学创作	
丁玲小说创作的时代感.....	
“洋场社会”的风情画.....	

——试论张爱玲在上海时期的小说

略论谢冰莹的前期创作..... (178)

一颗闪亮而早逝的星..... (192)

——罗淑和她的创作

略论罗洪的创作..... (205)

论萧红的小说创作..... (218)

论萧红散文的艺术风格..... (231)

“心底诗 心底歌”..... (246)

——谈萧红的诗歌创作

抗战烽火中的响亮号角..... (259)

——评关露的诗

后记..... (269)

中国现代女作家论纲

数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坛，基本上由男性作家统治着。虽然也出现过蔡文姬、薛涛、李清照、朱淑真、秋瑾等少数才女，但与男性作家相比，不过是寥若晨星，难以匹敌。到了“五四”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一大批杰出的女作家相继登上文坛，以数量可观的优秀之作，显示出自己的实力，成了现代作家中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在这批女作家中，成绩卓著，特别引人注目的有：冰心、庐隐、冯沅君、石评梅、陈衡哲、苏雪林、白薇、凌叔华、陆晶清、袁昌英、丁玲、谢冰莹、林徽因、赵清阁、萧红、罗淑、罗洪、张爱玲、关露等。为什么“五四”以后女性作家成了文坛的重要一翼？她们的创作有什么特色？有何嬗变、演进？对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研究一下这些文学现象，无疑是有意义的。

中国现代女作家蜂拥而出，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从生理学的角度看，男性与女性在智商方面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早在氏族社会初期，曾出现过母系氏族社会，在

氏族内，女性居于支配地位，受到男性的敬重。其文化形态，也呈现出鲜明的女性中心意识。在原始宗教和神话传说中，作为主宰万物的神灵的性别多是女性，例如造人的女神是女娲，偷吃了知识之树上的禁果，使人类有了知识的人类始祖是夏娃。“一些强有力的自然景观通常被认为是女性意志的体现。在澳大利亚部落人中，日化身为女性，月化身为男性；太平洋群岛中的安达曼人确信太阳是月亮的妻子；古埃及人以天为女，以地为男。”^①这种文化现象，说明女性并非生来就是弱者，至少可以说男女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随着母权社会的崩溃，父权社会的确立，女性的命运和地位随之发生了变化。她们逐渐失去了统治地位，变成了男性的附庸。到了阶级社会，男性为了强化自己的权力，则从各个方面，利用一切手段禁锢女性。他们歧视女性，称女人为“小人”、“祸水”，是“肮脏的一堆”，罪恶的象征。在男人的眼里，女性的全部价值不过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工具。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这种“男尊女卑”的观念在不断强化。“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贞操观念和女性观，象绳索一样，束缚着女性们的个性发展和聪明才智，久而久之，男女在心理个性、文化素养等方面的差异扩大了。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女作家寥若晨星的主要原因。

震撼神州大地的“五四”惊雷，唤醒了在铁屋子里沉睡的知识青年的自由民主意识。一批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的时代

^①孙绍先：《女性主义文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新女性，冲破封建思想的禁锢，竞相登上新文坛，打破了两千多年来男性独居文坛的局面，在神圣的文学殿堂里取得了一定位置。这种文学现象，同封建社会女作家寥若晨星一样，也不是偶然的。

马克思说：“每一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醒来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①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政治运动，也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在西方自由民主新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的知识分子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深感旧思想旧文化严重地阻碍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必须发动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和旧道德，向民众灌输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作为新文化阵地的《新青年》，率先向旧营垒发动了猛烈攻击。陈独秀和他的同仁们，指出儒家学说是封建专制的思想支柱，“三纲五常”违背人权学说，于是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掀起了争取自由民主、个性解放的浪潮。几千年来，受封建旧传统旧道德迫害最厉害的是妇女，因此，在这场思想文化的革命中，妇女解放成了一个重要方面。一些革命先驱者，非常重视妇女解放。李大钊写了《妇女与Democracy》，明确指出，“我们若是要求真正的democracy，必须要求妇女的解放”。^②当时，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也都写了一些抨击封建礼教、鼓吹妇女解放的文章。在思想启蒙运动和妇女解放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85页。

②李大钊：《妇女解放与Democracy》，载1919年10月《中国少年》第1卷，第4期。

浪潮的推动下，一批知识女性自我意识开始觉醒，有的冲破家庭的阻力，撕破封建婚约，走上社会，投入思想解放运动；有的被“五四”运动卷出狭小的家庭和学校的门槛，追随着时代的浪潮，奔腾向前。前者如庐隐、冯沅君、白薇、谢冰莹，后者如冰心、凌叔华、张爱玲……她们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切身感受，以及耳闻目睹的种种社会现象，通过自己的笔传达出来，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五四”时代风貌。可以说，“五四”运动孕育了现代女作家，现代女性作家也为“五四”运动作出了切实的贡献。

女性作家的崛起，除了历史的原因外，还有女性作家自身的因素。翻开中国现代文学史，我们发现，大多数女性作家都出身名门望族，书香人家，受过良好的教育。例如冰心，她出生在一个有文化氛围和民主空气的家庭，祖父是前清秀才，很有学问；父亲是清末和民国的海军军官，是个有爱国心的军人；母亲慈祥善良，有很好的文学修养。童年的冰心，在父母的诱导下，走进书的世界，陆续阅读了《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再生缘》、《儿女英雄传》、《说岳全传》等大量的小说及诗词，受到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跨进文学的大门后，她又接受了新的学校教育，获得了新的知识和新的思想，不仅“知道了杜威和罗素，也知道了托尔斯泰和泰戈尔。”这为她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新文学的蓬勃发展，又为她提供了施展文学才能的天地，于是她怀着强烈的创作欲望，走上了文学道路。此外，冯沅君、庐隐、石评梅、凌叔华、苏雪林、白薇等，也都是大家闺秀。尽管她们走上文学道路的原因和动机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

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都受到了时代新思潮的影响。假如没有良好的文化素养，没有自我意识的觉醒，现代女作家的出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从步入文坛的时间和创作特性来看，中国现代女作家大致可分为两代。第一代出现在“五四”时期，代表作家有：冰心、庐隐、冯沅君、石评梅、陈衡哲、苏雪林、凌叔华、白薇等；第二代出现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四十年代，代表作家有：丁玲、谢冰莹、林徽因、萧红、罗淑、罗洪、张爱玲、关露等。两代女作家的创作尽管有明显的不同，但也有共同的特点，她们的文学事业都与特定的时代紧密相联，都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

“五四”时期，是历史大变动大转折的时期。西方思想文化的涌入，新旧思潮的激烈交战，唤起了作家们对社会人生问题的思考。“文学革命”一开始，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们就强调“以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去指导新文学的创造”，并树起了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两面大旗，把文学当成了思想启蒙和改造社会人生的重要工具。许多投身新文学运动的作家，在这两面大旗的指引下，把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了封建专制制度。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被“五四”惊雷震上文坛的冰心、庐隐、冯沅君、石评梅等，称得上是思想革命的“第一线的先锋队”。

首先，她们出于对妇女命运的特别关切，选择好反封建的突破口——妇女问题，向封建礼教发动猛烈进攻，提出了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等妇女解放问题。冰心的笔触最早伸向了社会组织的细胞——家庭。她在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中，通过两对夫妇的对比，探索了

美满的婚姻与事业成败的关系，提出了一种新贤妻良母主义。这种新贤妻良母主义，虽然还有浓厚的封建意识，但多少涂上了一层薄薄的“西方文明的金液”。如果说在《两个家庭》中冰心对社会问题的认识还有些朦胧的话，那么她的《秋雨秋风愁杀人》则以三个时代新女性人生的坎坷，揭露控诉了封建旧家庭压抑、禁锢民主自由思想的罪恶。庐隐是一位富有反抗精神的女性，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她主张“打破家庭的藩篱到社会上去，逃出傀儡家庭，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作个女人，还要作人。”她的小说《一个作家》、《一封信》、《灵魂可以卖吗》，集中探讨了妇女的命运问题，揭露了金钱势力、封建包办婚姻对青年女性的戕害、摧残。石评梅在学生时代写的剧本《这是谁的罪》，不仅揭露了封建家庭干涉婚姻自由，制造爱情悲剧的罪恶，而且提出了青年们有可能被封建势力所“软化”的社会问题，这是“评梅为妇女们和青年们走上新路、反对‘软化’而作的一个不平常的呐喊。”白薇的剧作《炸弹与征鸟》、《打出幽灵塔》的主人公，都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茅盾语）。她们的思想和行为，无疑是对黑暗的反动势力的反抗。冯沅君更是以“毅然和传统战斗”的勇士的姿态投入新文学运动的。她的恋爱小说，反映了“五四”时期觉醒了的青年女性为争取个性解放、婚姻自由所作的努力与斗争。在《隔绝》、《隔绝之后》、《旅行》等小说中，她借人物之口，传达了时代女性的心声：“人生原是要自由的，原是要艺术化的”，“生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愿作“方生的主义真理的牺牲者”，绝不作“已经宣告破产的礼法的降服者。”小说中

的主人公，在封建势力的压迫下，虽然都没有摆脱悲剧命运，但她们反封建的高昂斗志，对人生理想的热切追求，对当时的青年，产生了巨大的鼓舞力量。

在探索妇女问题方面，凌叔华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角度。

“她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婉顺的女性。”^①的确，凌叔华不同于冯沅君，她的目光注视着封建家庭影壁、屏风后的生活内幕，向人们讲述的多是“五四”妇女运动外的闺门故事，较多地关注着妇女的人身依附问题、经济自立问题、独立人格问题、自信力问题。出现在她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不是旧家庭中的小姐，就是旧家庭中的太太。她们多出身豪门巨族，深受封建礼教之害。在“五四”妇女解放运动中，有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渴望过上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如《绣枕》中的大小姐；有的冲破封建家庭和礼教的束缚，跨出闺阁，走上社会，开始探求理想的爱情和有价值的人生，如《吃茶》中的芳影，《茶会以后》中的阿英、阿珠姐妹，《说有这么一回事》中的影曼和云罗；有的仍在封建气息浓重的旧家庭中，充当贤妻良母，扮演着家庭主妇的角色，如《有福气的人》中的章太太，《中晚秋》中的敬仁太太。凌叔华笔下的女性，多是温婉的，软弱的，虽有幻想，但缺乏时代新女性的勇敢行动，最终都没有逃脱被时代所抛弃的命运。凌叔华的小说，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妇女解放的任务并没有完成，要将广大妇女从封建势力的压迫下彻底解放出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①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其次，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崛起的女性作家，顺应“五四”时期探究社会人生的风气，在关注妇女命运的同时，将创作视线移向更广阔的世界，反映了更为深广的社会问题。诸如家庭问题，军阀混战问题，劳工问题，人生问题，青年问题，儿童问题等。

冰心创作的一些“问题小说”，则集中地反映了这些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斯人独憔悴》写的是旧家庭中父与子的冲突，作品中的一对青年，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却被顽固的父亲所禁锢，最后做了封建家庭的俘虏。这场父子冲突，反映了新旧两种思想的斗争，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去国》写一个留学归来的青年，纵有满腹才学，报国壮志，却无用武之地。最后，美丽的理想被冷酷的现实击碎，不得不再次离国而去。小说揭露了北洋军阀政府压抑人才、摧残人才的罪恶，提出了一个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在探索人生方面，《超人》是一篇代表作。主人公何彬原来的人生态度是超然物外，仇视社会，幻想做个“超人”，以求得解脱。后来为童心与母爱所感化，认识到“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小说反映了“五四”落潮期一部分青年找不到出路的苦闷情绪，因而引起了社会反响。但冰心在小说，以及诗歌、散文中反复宣扬的“爱的哲学”，都是不切实际的，不能解决任何社会问题。作为母亲，冰心与凌叔华都与儿童保持着天然的联系，她们怀着一颗不灭的童心，写了一些儿童题材的作品。冰心的著名散文集《寄小读者》，凌叔华的小说《小哥儿俩》，都写了儿童心灵的纯真、无邪。与颂扬童心、母爱相反，冰心、石评梅等人，还

怀着满腔的愤恨，揭露了军阀政府的法西斯暴行，以及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冰心的《一个兵丁》、《一个军官的笔记》、《一个不重要的军人》，都是描写战争题材中有一定影响的作品。石评梅为怀念刘和珍而写的《血尸》、《痛哭和珍》、《深夜絮语》等散文，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控诉了北洋军阀政府屠杀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的血腥暴行。

总之，这一时期女作家的创作，提出了许多尖锐的社会问题，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世界观的局限，对问题的观察和认识还不深，至于如何解决问题，却无能为力了。正如茅盾批评冰心时所说的：“她既已提出问题，她并且企图给个解答，然而由她生活所产生的她那不偏不激的中庸思想使她的解答等于不解答；末了，她只好从‘问题小说’逃走了。”^①

第三，“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家，在探索社会问题的同时，还喜欢“表现自我”。她们往往采用“自叙传”的形式，表现个人的生活经历，宣泄个人的思想情绪。作品中的“我”或知识者形象，往往就是作者本人或朋友。即使不直接表现自己，也可以寻到作者的某些生活和思想轨迹。茅盾在评论庐隐时说：“我们读庐隐的全部著作，总觉得她的题材的范围很仄狭；她给我们看的，只不过是她自己，她的爱人，她的朋友；——她的作品带有很浓厚的自叙传性质。”^②的确，“表现自我”，写个人的经历、遭遇和心境，成了庐

^①茅盾：《冰心论》，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②茅盾：《庐隐论》，载1934年7月《文学》第3卷，第1号。